

《老子》与中国国家起源的形式

陈鹏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在国家产生前的部落社会时代, 部落联盟领袖赢得民众拥戴的方式, 不仅是其取得领袖地位的途径, 同时也反映出了各个国家独特的起源形式。本文通过对《老子》书中提倡的“重民、不私、博施济民”的上古“圣人”形象的分析与归纳, 结合中国部落联盟领袖成就功业的典范事迹, 力图从文化现象分析的角度阐明“施舍聚民”这一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形式。

关键词: 国家起源 《老子》; 施舍聚民

中图分类号: K02; D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4)01-0131-06

人类在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多种类型的文化。而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每一项重大创造, 在解决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同时, 也成为了塑造各自独特文化的“制造工序”。其中, 国家起源的形式正是诸多文化“制造工序”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换言之, 世界上各个国家起源的形式, 对各国独特文化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 我们亦可通过对国家起源的相关文化现象的解析, 来探寻各个国家起源的独特形式。

《老子》作为中国思想史上较早问世的一部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思想的经典传世文献, 其书成之时便引起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轰动, 并在后世传习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书中基于对“道”的体悟进而提出对上古圣人品行的倡导, 恰与中国前国家时代部落联盟领袖取得统治地位的事迹十分吻合, 而部落联盟领袖的成功经历又与国家起源的形式息息相关, 因此成书于二千五百年前的《老子》^①或可成为我们开启中国国家起源之门的钥匙。

一、中国国家起源探索中的文化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起, 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以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吸引了众多学者为

之求索几十年而热度不减。虽然研究成果颇丰, 但争议也随之大量涌现。究其根本在于考察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所采用的参考标准是否符合中国国家起源的客观实际。当学术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 由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盛行, 恩格斯的名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似乎就成为了唯一可以为解决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所采用的理论支持。然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中所提出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式的人类社会演进理论的影响下, 以欧洲最早的三个国家——雅典、罗马、德意志的产生形式为考查对象, 并创造性地使用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完成的。恩格斯的这部经典之作确实揭示了欧洲国家起源的途径, 对探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这并不代表欧洲国家起源的模式就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 当面对中国与欧洲之间巨大的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时, 若仍以欧洲国家起源的规律作为探讨中国国家起源的标准, 那么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如恩格斯在书中说道: “在罗马, 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 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 站在这一社会之外

收稿日期: 2013-05-13

作者简介: 陈鹏(1981—), 男, 山东沂水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所引《老子》章句以王弼注本为主。1974年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本, 此后陈鼓应结合帛书《老子》并参考各家学说著成《老子注译及评介》, 本文亦参校引用。虽然《老子》各版本中皆存在一些误、衍、脱、佚之处, 但在《老子》主体思想和表述内容上基本一致。

的,是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中了。”^①即是说,欧洲国家的产生是建立在打破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中国国家的产生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打破,甚至是国家得以建立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在中国国家发展历程中长期存在着。而有的学者却将欧洲国家产生的模式视为普遍规律,并以这一规律为准绳来研究和探索中国国家起源的道路,其结果可想而知——唯有削足适履,违背中国国家起源的客观实际情况以适应欧洲国家起源的“普遍规律”。

其实,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诸多争论,无非是纠结于国家起源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的问题。恩格斯说“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②据此,有些学者便将希腊的国家起源形式视为国家起源的普遍规律,然而“典型”并非等同于“普遍”,“‘典型’是指具有同一个相似特征的特殊类型中的各个‘个体’中其‘相似类型特征’最突出者”。其实“希腊和中国的国家起源各有其‘特殊规律’,但这两个规律都是符合国家起源的普遍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即在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产生什么样的国家,是与此种方式中公共职能和为履行公共职能而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特殊阶级的出现分不开的。而之所以会表现出‘特殊’,在于不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产生不同的公共职能和履行公共职能的特殊阶级,并因此导致不同的国家形式”^③。在中国学界,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发现一种国家起源的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为理论指导,以求探明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形式。这种做法本身就混淆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性质。国家起源的一般规律固然重要,但一般规律只是说明国家起源上的共性,当我们返回现实中进行考察

时,却发现具体的国家的起源状况常常会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国家起源的形式时,研究的重点则应侧重于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说“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④实际上,“国家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原因和它采取的表现形式是研究和理解国家理论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前者也许是个民族政治与文化中的共性,后者则是其个性;前者是国家产生的经济背景,后者则是其文化的背景。”^⑤也就是说,国家起源的形式体现出了一个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而同时国家起源的形式又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此,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形式的特殊规律时,以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形式进行解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常金仓先生针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一次文化解析的尝试。他通过广泛考察世界各民族部落社会酋长的选拔情况发现,在世界上一些先民社会中,部落头人或酋长首先通过辛勤劳作积累财富,然后再以施舍或赠送的方式分予族人,以求达到树立威望,获得族人拥戴的目的。同时,常金仓先生在中国上古文献典籍中也发现了许多关于中国史前时代部落领袖依靠“施舍赠财”及类似形式获取领袖地位的评述。由此,常金仓先生提出了“施舍聚民”的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形式。^⑥笔者发现《老子》书中所载之圣人形象,与常金仓先生提出的中国的国家起源形式十分契合,因此本文以期通过对《老子》书中的圣人形象的解析,进一步阐明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形式。^⑦

①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5-166页。

③ 巴新生、李友东《探讨中国国家起源的几种理论模式的回顾和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⑤ 常金仓《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及其影响》,《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⑥ 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⑦ 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虽然也论及“圣人”,但大多与本文讨论的“施舍聚民”的国家起源形式无关。涵义最近者仅见《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此外再无述及。而《老子》几乎通篇不离对“圣人”的描述,且老子向往“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子》八十章)的部落社会时代,加之《老子》书中描述的“圣人”品行与五帝事迹最为贴切,因此《老子》较之其他子书更加适合作为考察中国国家起源形式的文献材料。

二、《老子》倡导的圣人行

老子学说是以“深奥玄妙”，不易为人所认知的“道”的观念展开的，看似已经超越了对人类社会的考察层面，但实际上老子所关注的终极问题还是人类社会的治乱。如《老子》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虽然老子常常用“无为”来描述“道”的特性，但目的还是为了劝谏统治者能够以“道”的规律为准则，循“道”而为。老子又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十四章）此句中，老子指出一则“道”的规律，即采用早已形成的法则，来指导当今具体的行为，如此才能了解世界是如何源始的。因此，老子所阐述的治国理念，自然也是追溯上古圣人先贤的治世事迹，并以此为后世统治者所效法的典范，这是符合老子提出的“道纪”的思维逻辑的。而老子对圣人先贤的品格及治世经验的描述，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揭示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形式的线索。

（一）“道”的品性

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围绕着“道”展开的，把“道”视为生养世间万物的“玄牝之门”，故《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认为人类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莫不生于“道”，并遵循“道”的规律而生存发展。实际上，这个被老子奉为万物之宗的“道”，就是使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但老子又指出，“道”的品性虽然伟大，却极不易为人所认知。《老子》十四章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所以，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的体悟“道”的无上品德，老子在现实世界中举出一种最近似于“道”的现实事物为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在自然界的所有物质中，水的品性是最接近于“道”的。它滋润万物，却与世无争；甘心处于众生所厌恶的地方，为众人所不愿为之事。这恰恰符合“道”的“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的崇高品性。“道”生养万物而不占有，为自然万物提供生存的环境与条件，却不为主宰。“道”施与世间万物生存所需的所有要素

却不求回报，丝毫未表现出支配的欲望，所以万物依赖“道”却并不察觉“道”的存在。老子将这种无上品性称为“玄德”。正因为“道”具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老子打比方说“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老子》三十二章）而“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道”以其不自大，故终成其大，使世间万物汇聚于它的盛德之下。可见，老子提倡的“道”具有施与万物恩惠却毫无索取的伟大品性。

此外，老子也描述了一个世间万物由发生到成熟的过程，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章），这一过程就是自然造物的过程，是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人类社会自然也属于万物之列，“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可以看出，老子的思想体系是通过世界本原——“道”的认识，进而延伸到人生论和政治论。那么老子提倡的圣人品德也应当是基于对“道”的品性的认识。

（二）《老子》提倡的圣人行

在上古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规律还不甚了解，对大自然的力量充满着敬畏，所以睿智的圣人先贤也自然而然地效法自然运行的规律——“道”，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而在老子看来，“道”是因其博大无私的品性成就了天下至尊的地位，那么上古时代的统治者也应该效法“道”的品行。故《老子》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二十二章）这里的“一”即是“道”，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成为万民敬仰、天下归心的圣君明王，就应以“道”的品性为典范。只有具备了“道”的品德，才会像万物遵“道”那样受到天下人的推崇，即“执大象，天下往”（《老子》三十五章）。

基于对“道”的效仿，老子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这段话看似人生格言，实则是老子对其所提倡的圣人品格的总结。老子所说的“慈”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慈

爱,而是升华到无私境界的博爱,这便是对天下苍生的慈爱,故《老子》四十九章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说,只有常无利己、私欲之心,才能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把为百姓谋福祉作为人生第一要务,不得患得患失、宠辱若惊。“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也就是说,只有把治理天下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的人,百姓才会把天下托付给他。同时,正因为具有对人民慈爱之心,才会勇于放弃个人的私利,而以天下的利益为重,所以老子说“慈故能勇”。而这种勇气的突出表现便是“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二章)。可以看出,老子提出的“勇”,是勇于牺牲个人的私利,率领天下人民谋求福祉,却不抬高自己的地位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处处以民为重才能真正做到“功成而弗居”,这是需要真正的勇迈之气才能做到的。然而,也正是“功成弗居”、“知其雄,守其雌”(《老子》二十八章)的伟大品德,才能赢得民心所向。故《老子》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九章)因此,作为一个出色的统治者理应具备“慈”的高尚品格与情操,这也是赢得天下百姓的推崇所不可或缺的伟大品德。

当“慈”的品德外化为实际行为时,便是老子所提倡的“俭”。老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以天下百姓为重,摒弃利己的私欲。即所谓“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不应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百姓利益之上。如果关闭了急功近利的私欲之门,将受益终身;若利欲熏心,则无药可救。故《老子》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即警告统治者:朝政腐败,田地荒芜,而统治者却锦衣玉食,聚敛财富,这是国贼的行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若一味聚财,终将遭百姓所唾弃。所以老子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为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老子》五十九章)“嗇”就是上文的“俭”,意为国君治理百姓与提高自身修养,皆应以节制自己的私欲为重。这

样才能在民众中树立威望,君王才会受到万民的景仰。

老子不仅在个人的品格修养上提倡“少私寡欲”的“俭”;在实际行动中,老子更是提出了节俭的美德,这便是“俭”的第二层涵义。《老子》曰“大小多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六十三章)这句话指出了聚小为大、积少成多的道理。只有从点滴细小的积累做起,才能广积财富,并终成其大。因此老子说“俭故能广”,意为节俭才能广积财富。《韩非子·解老》说:“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宝爱其神则精盛。”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也说“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这些都是对《老子》提出的“俭故能广”的正确解读。

在“慈”和“俭”的基础上,老子又进一步提出了“不敢为天下先”的圣人品德。《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基于对自然运行规律的观察,老子认为,象征自然的“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关键在于它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自身,而是无私地服务于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正因为天地具有如此无私的品格,才得以生生不息。那么,作为圣明的君王也应效仿天地的品行,凡事以民为先,“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六十六章)。亦即具备谦退无私的美德,凡事以人民利益为先的“圣人”才能为天下百姓所信赖;也只有具备“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能遵“天之道”,损己之“有余”以奉天下之“不足”,如此才是“有道者”^①。故老子总结道“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其深层次含义是:圣人之所以能使天下归心,是凭借广博地施予百姓恩德。换言之,君王须具备博施济民的圣人品格,才能终成为百姓“乐推”的领袖,即“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

由上可见,基于《老子》书中描述的“慈”、

① 《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俭”、“不为天下先”的崇高品行,我们便可勾勒出一幅“重民、不私、博施济民”的圣人形象。

三、中国国家起源的形式——“施舍聚民”

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的产生,大致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从氏族成员中产生出一个或几个部落酋长来,它是血缘组织以外公设的权力机关的代表,然后才能由这些部落酋长渐次攘夺公共权力,取代氏族组织”。^① 这些部落酋长便是国家形成后的专制君主的前身,而公设的权力机关逐渐演化为国家机器。学界普遍认为在国家诞生的道路上,世界各国走过的这一过程大抵相同,然而各个国家的制度、体制与文化普遍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实,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部落社会时期的酋长是如何取得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拥护,并最终获取领袖地位的途径。这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的形成方式,也为塑造该国文化的特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虽然在中国有关上古时代的文献中缺乏对部落酋长获取领袖地位的方式的明确记载,但《老子》书中提倡的圣人品格及治世经验,却隐含着中国国家产生前的部落酋长的成功经历。因此,老子由悟“道”而提出的“重民、不私和博施济民”的圣人品格,也成为我们得以准确把握中国史前部落社会酋长如何取得统帅地位的重要途径。《史记·五帝本纪》载“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可见汉代的人已经将“五帝”时代视为遥远的古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部落社会酋长取得统治地位的方式的重要考察对象。由此,我们将《老子》书中所载之圣人品行与“五帝”事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便可廓清中国国家产生前部落酋长获取统帅地位的基本情况。

《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囂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这段文字道出了一个问题,部落联盟的首领颛顼死后,由他的族子高辛继承了部落首领的位置。然而,颛顼本有一子,名叫穷蝉,可以继位。

况且高辛与其父以及祖父皆未曾取得过帝位,为何颛顼却将帝位禅让给帝喾高辛呢?《史记·五帝本纪》对帝喾高辛做出的评价是“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喾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由此可见,帝喾之所以能够继承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他能够爱民、节俭,慷慨地施舍百姓而不图私利。因此,帝喾赢得了天下百姓的拥戴,成为继承大位的不二人选。帝喾的事迹与《老子》书中所描述的“重民、不私、博施济民”的圣人品格十分契合。而像帝喾这样,通过博施济民而取得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方式,几乎成为其后继者效法的典范。例如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历代帝王之楷模的唐尧和虞舜,他们几乎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尧曾这样描述道:

帝尧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

可见尧虽然富贵,却不骄奢、傲慢,并且非常节俭,与庶民一样身着“黄收纯衣”^②。《尹文子》亦云“尧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苍生。”既而,百姓才会“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尧也是以广施恩惠于人民来赢得万民归附的。而尧的继任者舜,也是通过“博施济民”的途径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决定其子丹朱与舜,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的时候,曾有这样一段叙述“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从尧对其继任者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舜之所以能够得到尧的肯定,是因为舜若治天下能使人民得利。换言之,舜能做到以民为重,与民谋利,且广施恩惠于人民,因此舜才被视为具备领袖的资格,才会得到万民的拥戴。而且在尧死后,舜曾想把帝位让与丹朱,但天下百姓都不尊从丹朱却追随舜^③。于是,舜顺应天意民心,继承帝位,成为继唐尧之后又一位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由此可见,舜以“博施济

① 常金仓《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② 《史记索隐》:“收,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象古质素也。”《史记集解》引郑玄曰“纯衣,土之祭服。”

③ 《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讼狱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

民”的方式,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同样地,以成功治理洪水的功绩而闻名天下的部落联盟领袖禹,也是通过“博施济民”的方式赢得了民心。《史记·夏本纪》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溼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方式来调整财产的再分配,且这种方式与《老子》中“道”的品性完全吻合。而禹“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也正是布施恩惠于百姓的圣人品格的体现,并且禹也以此实现了“万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的伟业。

然而在对待“施舍聚民”这一部落领袖普遍践行的成功法则的看法上,并非都是正面的解读。^①如《庄子·徐无鬼》曰“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而十有万家。”虽然庄子讽刺舜以“膻行”利诱百姓才取得部落首领的地位,百姓追随舜,也不过是“蚁慕羊

肉”有利可图。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舜及其他著名部落领袖取得成功的事迹已经证明了,“施舍聚民”的方式是中国国家起源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赢取领袖地位的方式。

综上所述,通过对《老子》书中所提倡的“重民、不私和博施济民”的圣人品格,与中国史前时代部落联盟领袖的成功事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我们得以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方式:即中国史前时代的部落联盟领袖们是通过“施舍聚民”的方式取得其领袖地位的,并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后世国家的专制君主。中国这种独特的国家起源方式,不仅体现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也对中国后世的政治制度、民族性格以及礼乐文明的形成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明: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巴新生先生在理论和文字上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林日杖)

Tao Te Ching and the Form of Chinese State's Origin

CHEN Pe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tribal societie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tate, the way of the chief of tribal alliance gaining the tribal members' supports is not only the means that the chief achieve the leadership, but also the reflection of the special form of a state's origin.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gathering people in benefaction", the special form of the Chinese state's origin, by illustrating the images of saint in ancient times with features of paying regard to people, unselfishness, benefa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outstanding story about the successful chief of tribal alliance.

Key words: the origin of state, Tao Te Ching, gathering people by benefaction

^① 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